·国民党军事机关与辖属·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人事内幕

赵 毓 麟*

国民党的军事最高统帅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下设三处：简名侍一处、侍二处、侍三处。侍一处主管军事，侍二处主管政治，侍三处主管人事。自侍从室成立一直到抗战结束后撤销为止，侍二处主任一直由陈布雷担任，侍三处主任一直由陈果夫担任。侍一处主任则更动频繁，张治中、贺耀组、商震、钱大钧、林蔚等均担任过。报纸上载的侍从室主任，实际为侍一处主任，就其职权来说，既管不了侍二处，也管不了侍三处，它们是相互并立的。侍三处主任陈果夫，有个机要秘书，名朱国材，安徽省合肥人，系我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的同期同学，私交较好。抗日战争期间，他住在重庆曾家岩陈果夫的私邸内，我们经常来往，从而了解一些侍从室人事内幕。另一同学曹圣芬，充当蒋介石的随从秘书，亦偶谈侍从室情况。兹据记忆所及，述其人事内幕鳞爪于下。

一、执掌枢密的陈布雷

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三个处中，以侍二处为最重要。凡以蒋介石的名义给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主管人员的公文，都是由侍二处承办的。不论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呈报蒋介石（蒋为国民党总裁）的公文，或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呈报蒋介石（蒋为行政院院长）的公文，或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呈报蒋介石的公文，均送由侍二处转呈。至于各省市地方首长请示蒋的文件，亦均由侍二处转呈。因此，侍二处主任陈布雷在一个很长时间内，便成为蒋介石的左右手。

陈布雷为浙江省慈溪县人，与蒋介石系属于宁波专区以内的同乡。在北伐以前，陈布雷在上海申报馆做编辑。申报所撰社论，在标题下面注有“雷”字的文章，即为陈布雷所撰述。在北伐以后，他曾做过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因他擅长文笔，且为浙江同乡关系，深得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器重。在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下，很容易地占领了我国东北。蒋为掩饰其对日屈服、媚敌辱国的行为，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将军事重点放在“剿共”上面，且于南昌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并以政学系首要杨永泰为秘书长。杨极得蒋的宠信，重要策划均出自杨

* 作者曾任国民党工商部特种经济调查处上海办事处主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手。杨藉机扩张政学系的力量，并多方打击 CC 系实力。陈果夫、陈立夫乃推荐陈布雷到蒋介石处执掌机要，并向蒋建议，说杨永泰“志大才高，堪当方面之任”，将杨外放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实际则是调虎离山之计。

陈布雷自从执掌与处理蒋介石的机要文件后，因为他并无政治上的野心，不想自成派系，蒋对他很为放心。国民党内部 CC 系、政学系、复兴社、黄埔系，勾心斗角，尔诈我虞。陈布雷就事论事，比较“正直”，因而陈果夫、陈立夫在背后常有对陈布雷表示不满的言论。但陈布雷处理事务，稳健而练达，所以能久于其位。

当 1949 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彻底胜利后，蒋介石用以打内战的本钱，已经输得精光。但是蒋介石一再令陈布雷主持筹划对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所谓“总体战”方案，想动员长江以南的国统区的全部人力、物力、财力，作最后挣扎。陈布雷对国民党的处境，是心中有数的。他认为没有希望“挽救危局”，并认为将来的局面要倒转过来，就是国民党及其军队要退居中国僻远之区，要过红军那样艰苦的生活，而共产党及其军队今后则居于通都大邑、物产丰盛的区域。因而陈布雷自认为体质衰弱，过不了那种想象中的艰苦万状的生活，所以决定在“六十衰老之年”（在他的遗书中的原话）服安眠药自杀。

在陈布雷自杀前，因蒋介石不断逼催他筹划“总体战”方案，陈布雷曾向陈立夫发过一次牢骚，说：“总裁常以诸葛亮自况，每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诸葛亮批阅公文,史书载他凡罚 20 以上，皆亲鉴焉，现在总裁怕见 20 个字以上的文件，如何是好？听说共产党毛泽东对一切重要文件，都是亲自执笔的。”不管蒋介石怎么催逼他，还是逼不出来，转而逼出一个陈布雷自杀事件，当时在国统区是有巨大影响的。

二、机要秘书的烦恼

蒋介石在北伐战争时期，以陈立夫为总司令部的机要秘书。北伐以后， 27 岁的陈立夫转任国民党党务，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并推荐其留美同学高凌百为蒋的机要秘书。后来，因高凌百被牵涉到北平故宫博物院盗宝案件而被解职，陈果夫乃推荐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毕业的学生萧乃华为蒋的机要秘书。西安事变中，萧坠落华清池内淹死，又由陈果夫遴选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第一期毕业生萧自诚为蒋介石的随从机要秘书。1943 年，萧自诚外放为浙江省某区行政督察专员，又由陈果夫遴选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第六期毕业生曹圣芬为蒋的随从机要秘书。从中可以看到一脉相承的关系。

当然，蒋介石的机要秘书，不止一人。国民党内各派系，都想向蒋推荐，藉以暗通消息，便于自己扩充力量。例如，黄埔系曾向蒋推荐萧赞育为蒋的秘书，在很长时期内，他一直在侍从室内工作。我从与曹圣芬的接触中，了解做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是一个很令人烦恼的职务。蒋介石平日对其左右人员，督责很严，稍不如意，动辄恶语相加。因此，他们很不愿意长期在蒋左右，而企求外放，行动上要自由得多。在生活待遇方面，他们吃的伙食较好，过年过节，除侍从室有津贴外，另有一些机关（例如军统局就是一个）对他们有所馈赠。虽然这样，他们还是不肯长期追随蒋介石，总想早些离开，但又不敢启齿，只能到陈果夫处去活动。取得陈果夫同意后，由陈出面向蒋解

释，才准予外放。萧赞育亦有类似情形，据说萧任陆军少将达十年之久，不得迁升，因为他一直在做蒋的侍从秘书。为此，萧在背后亦发怨言。

三、陈果夫的政治野心

身患严重肺结核症的陈果夫，是有很大的政治野心的。他一贯认为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尽管改朝换代，总是离不了由士大夫阶级专政。他在担任侍三处主任后，就一直企图通过侍三处控制国民党统治地区内各党政机关的人事，特别是高级党政人员。该处对国民党高级党政人员过去的经历及当前的言行，经过调查之后，认为可以吸收为蒋介石忠实信徒者，调到中央训练团党政人员训练班，加以短期训练。该处在训练班常派有政治辅导人员，平日记录受训学员的思想言行。在受训后回到原机关，侍三处即与之建立通信关系。抗战期间，侍三处的处址在重庆小温泉，即在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的旁边，陈果夫以侍三处主任兼该校教育长。 1941 年 5 月下旬，当该校庆祝新的大礼堂落成典礼举行时，蒋介石亲往主持。当时，我以校友资格被邀参加。在典礼举行以后，陈果夫这么说：“ 我们要使中国的英才，尽为校长所用，无一遗漏。 ”当时，陈立夫任教育部部长，亦参加典礼，并说：“ 政府决定不使每一个人才被共产党利用。 ”实际上，他们广为培植自己的势力，在国民党内部，则尽力排斥其他派系的力量。

旧中国的外交界官吏，较高级者，都出身于清华大学。中级人员，以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毕业生为多。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设有外交系，每期学生名额原本不多，自第一期到第七期（我是七期毕业），共只 30 余人，平均每期仅五六人，但就这 30 余人，亦很难插足外交界。陈果夫为打开这一局面，运用侍三处，通过蒋介石名义，在 1942 年派政校出身的郑震宇为外交部人事处处长。自此而后，该校外交系毕业生均能到外交界工作，例如我同期同学赵金镛任驻英大使馆秘书、李光震任驻美大使馆秘书、刘宗瀚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以及中央党务学校出身的张道行任驻荷兰大使馆参赞等等。

在各省市地方行政机构中，陈果夫运用侍三处，派 CC 系重要骨干分子去任要职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如抗战期间，张群任四川省政府主席，陈派胡次威为四川省民政厅长；黄绍竑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派阮毅成为浙江省民政厅长；薛岳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派胡善恒为湖南省财政厅长。有人统计过，除党务人员不计外，以地方行政人员说，约有三分之一以上为 CC 系所把持。

在国民党军事系统内，陈果夫亦设法派一些学生进去工作，如抗战期间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机要秘书程大千、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的机要秘书周天固（均我同期同学）。国民党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在衡阳战役中，被日军生俘，后又被释回。这时，在国民党方面的报纸以及宣传机构大肆吹嘘方先觉“ 英勇抗战 ”，并夸张他在被俘后越墙脱逃，回到后方如同英雄奇迹。而在重庆发行的《新华日报》，则明白刊出方先觉是投降日军后被放回的。有识之士确信《新华日报》的记载，是合乎情理的。方先觉回到重庆后，蒋介石又派他为青年军二〇六师中将师长，驻于昆明。陈果夫则派中央政校毕业的学生祝麟为方先觉的机要秘书。祝麟系浙江省嘉兴县人，为我在政校同

同系同学。1939 年，祝麟在湖南省任国民党嘉禾县党部书记长，后于 1940 年到了重庆，经同学朱国材与谢永存的介绍，进入了中统局。他因学的是外交，一心想做外交官。有一天，他在报上见到军事委员会外事人员训练班的招生广告，上面说经录取后通过短期训练，可派赴国外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工作，他就向中统局辞职，去投考这个训练班，被录取了。在受训期间，他发觉这是一个军统特务机关所办的训练班，吃了一惊，也想辞去。但戴笠一查他的根底，知道他曾在中统局呆过一个短时期，便怀疑他是中统局派来刺探军统内部秘密的，当即予以扣押，一关就是三年。后来戴笠查明祝麟并非中统局派过去做工作的，他已辞去中统局的职务，就恢复了他的自由，但仍时刻派亲信特务监视祝的行动。在 1943 年 6 月一天下午 5 时，祝麟忽然神色张皇地走到我的办公室来，我深觉突然，问他从何处来？祝告知：从军统局局本部出来。据称，他在该局的一个同乡告知，戴笠最近又将关押他，希望当晚能走到小温泉去，因为中央政治学校校本部与侍三处均在小温泉，他可找到一个“避难所”。祝要求我念四年同学之情，护送他过江（原来军统局局本部在重庆上半城中二路棘子岚垭旁漱庐，中统局局本部即在它近旁的川东师范内，两局是相距很近的。要从这里到小温泉，必须由上半城走到下半城林森路望江门，过江到海棠溪，再由海棠溪行走十余里到小温泉）。我匆促地与他晚餐后，即陪伴他一直走到江边。他沿途惴惴然告诉我：万一在路上又被军统特务逮捕，请我转告侍三处设法营救。不久，陈果夫以此事呈报蒋介石，由蒋告诉戴笠“不得再事追究”。祝麟并被派到方先觉处。戴笠对这个“擅离职守”的人，也无可奈何。从这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例中，看出陈果夫运用侍三处在人事上所起的作用。

四、主管情报的侍六组

如上所述，侍二处是政治处。国民党中统局与军统局两个特务机关向蒋介石呈报的情报，都是由侍二处摘由转呈的。直接主管情报业务的，是属于侍二处的第六组，简称侍六组。在抗战期间，组长一直是唐纵（唐乃健）担任。唐纵与戴笠，本就是老特务处的同事，关系密切。中统头子徐恩曾与顾建中等一再怨言：唐纵对军统局是有偏心的，两局同一样的情报，到达侍六组，他要先把军统局的情报摘由向蒋报告。顾建中甚至埋怨侍六组将中统局先报的情报压下去，而将后呈的军统局情报送上去，使在蒋的心目中，中统局的工作总不及军统局。

戴笠对唐纵极力拉拢。在 1945 年国民党改选第七届中央执行委员时，戴笠为唐活动，请客拉票，终于将唐选为中央委员，而戴自己并没有参加竞选。由此，可见徐恩曾与顾建中等的埋怨，并非毫无根据。

蒋介石对于两个特务机关所呈的情报，除特别重要者外，一律由侍六组摘由后呈报，规定用上等道林纸恭楷呈上。对两机关下达的命令、指示，用军事委员会快邮代电的方式送下，快邮代电的年月日上，除盖有军事委员会的大印外，在代电结尾“蒋中正”的名字下，另加盖有一颗小的正方形印信，里面以篆体写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印信”20 个字。

五、有关用人的丑闻

1941 年夏的一天，朱国材与曹圣芬对我谈及，说“校长用人，喜用奴才，不喜用人才”，并举出一件从侍从室内部传出的丑事为证。

1941 年春，国统区由于生产萎缩，加以官商勾结，贪污横行，市场上物价飞腾，不独居民群众每天受到威胁，即一般中下级公教人员，同感生活困难。当时有一个曾做过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后又留学美国并于返国后担任过湖南省财政厅长的何浩若（湖南省湘潭人），通过侍从室向蒋介石献上一策，说应由国家来控制民生日用物品，成立物资局这一机构，以调节市场需要。蒋在无可奈何之中，认为这是一个良策，乃决定于经济部之下专设一物资局，即以何浩若为局长。新建的物资局，机构异常庞大。何浩若对于亲信人员，广为安置。该局局下设署，署下设处，处下设科，科下设股，拥有八署之多，单局本部职员即接近千人，远为超出经济部之上。而局内职员待遇之高，比起国民党中央各部会的同级职员，超出一倍以上。各部会职员，对此均有怨言。而两个特务机关（中统局与军统局）的职业特务，待遇与各部会职员相比较，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他们更经常有指责物资局的情报向侍从室呈报。

物资局于重庆郊外化龙桥附近设有一个巨大仓库，里面放有不少民生日用物品。据何浩若说，是用以向市场抛售，藉以调节物价的。但在国民党后期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情况下，该仓库职员常有与奸商勾结、偷盗物资出库、到市场黑市出售、藉以牟取重利的行为。事闻于蒋介石后，蒋令经济部清查。但当经济部正派员进行调查之际，忽然该仓库发生大火，大量物资竟被焚毁，导致调查工作发生困难。中统局当时根据各方情报分析，认为物资局职员有“监守自盗、纵火毁迹”的重大嫌疑，并以此呈报蒋。军统局方面亦有类似的报告。蒋在盛怒之下，于一天早晨在重庆曾家岩“官邸”召何浩若前去责问，首先问他物资局成立相当时日，为何物价继续上涨，并不见有何稳定迹象。何浩若推说，物资局控制的物资数量不多，所以调节物价不见大效。蒋对何讽刺地说：“如果你控制的物资更多，那化龙桥的火要烧得更大了。”何浩若当时进行答辩，说：“物资局仓库失火，损失很小，已扣押仓库主管人员，正在查询。只要稍假时日，待物资局控制的物资数量较多，自信必能收到稳定物价的功效。”蒋介石当时对何说：“强辩，强辩！”并不理何浩若，迳自退入后室。蒋的机要秘书萧自诚劝何去外间会客室休息。数小时后，萧自诚到会客室一看，见何浩若还是直挺挺地端坐在会客室内。萧自诚问：“何局长，时近中午还没有回去午餐？”何浩若答道：“委员长说要枪毙我，我等待委员长的发落。”萧自诚又将此情况回报蒋介石。蒋一听，转怒为喜，认为何浩若这人可以重用，因为何能死心塌地效忠于他，以后对各方面抨击何浩若的报告，置而不问。何听了蒋介石的宁波口音，把“强辩”二字误听为“枪毙”，所以在会客室等待。

主管蒋介石警卫工作的侍一处，内有一组专司蒋介石侍卫工作。担任过侍卫长的宣铁吾、俞济时，固然都是浙江人，而警卫人员也几乎全部是宁波地区人。有人称侍一处为浙江同乡会，并非虚语。

（1963 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

周 梅 庵*

抗战初期，蒋介石在重庆曾家岩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关于党政军的国家大事和一切政令全部由侍从室掌握处理，但是不对外行文，门口也不挂牌。

笔者那时在侍从室机要组任少校组员，任职时间很长，从成立时起直到侍从室撤销为止。担任的工作是收发、登记、拟稿、管档。现将我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比较突出的事记录下来，还望知其事者帮助补充或予以纠正。

一、侍从室机要组的职权

侍从室机要组成立于 1942 年，其组长为毛庆祥，是蒋介石的内侄，其职权之大是无与伦比的。他一身兼任数要职：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主任，都是中将级。他曾留学法国，对研究密电码很有兴趣，因此他的部属多数属于对军电密码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

机要组成立时用人很少，全部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机要室的现职人员中物色调来。机要组副组长徐宏清，机要秘书张廷桢，秘书朱少先，专员王俊杰、吴兴民，上尉译电员王礼安等三人，此外还有少校组员周梅庵、中尉副官罗乃清、少尉司书柳青康，一共有 12人。该组的职权是管理收管密电和党政军密码本的编制、使用、换发、保管等事项。关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机要室、军委会的技术研究室，以及军电管理处、译电人员训练班等机构均归机要组全权控制，一遇重要事件统由该组召集以上有关部门开会研究，作出最后决定，并以命令方式交下去执行。

在重庆抗战时期，凡属下达作战命令和部队调动布防以及有关军事情报等等的电信联络，统由机要组掌握与对方互通密电，如果线路中断时，就通过无线电拍发电报，并在必要时，还可利用电话报告作战情况，但拿起话机就可讲话的，必须先由对方电务人员把要说的话写成密码报出，再由接话人翻译出来然后处理，以防止情况被别人偷听，泄漏机密。

蒋介石有时巡察外省或去某战区亲自指挥时，其随从人员除一部分侍卫外，必须携带的还有机要组的译电员，每次都由该组的秘书张廷桢率领电务人员二三人携带必要的密电本随机出发。事毕返回时，他们都能得到意外收获满载而归。例如某省主席或者是

* 作者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机要组少校组员。

司令长官对随从人员赠送衣料和土特产品等，作为犒赏之用。在这里我应该指出张廷桢与毛庆祥的关系，张的妻子和毛的妻子是两姐妹，系联襟裙带关系，当然是异常亲密，因此得到蒋介石的特别信任，每次出发均由张一人包办电务工作。他的官运亨通，先任侍从室的秘书，抗战胜利后提升为国民政府机要室主任秘书，在改组总统府时升为机要室副主任，去台湾后又成为总统府机要室中将主任。

二、侍从室对特务情报军电的控制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是属于侍从室领导的一个特务机构，其局长一职原规定应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但事实并非如此，历届主任完全没有过问，而统由副局长戴笠一手全权包办。他的组织秘密，对外向来不公开，门口也不挂牌，他所做的工作连我们侍从室的人都不知道。在抗战初期，侍从室总务组有一位姓童的职员爱看进步书刊，他在办公时间内经常偷看《新华日报》（当时有通告禁止购阅），有一天忽被军统局传去禁闭起来，诬他有共产党的嫌疑，如不承认，则严刑拷打，此人后来下落不明。

军统局在各部门各军事单位都派遣秘密工作人员，尤其注重前后方部队长官的一举一动，不时向蒋介石作密报（所有密电情报都由侍从室译出呈阅），甚至对某军长挪用公款做投机生意，或对某师长狂嫖滥赌的事等等，都有秘密情报，蒋利用它作耳目。

1944 年，戴笠在重庆山洞设有秘密办公室一处，在他身边侍候的有年轻勤务兵二人，一名何义全，一名李伢子。何义全年纪最小，只 19 岁，很顽皮不懂事，每次戴出去以后，他就偷偷地跑到附近民家去赌博，只留李伢子在室看屋，因戴笠屡屡回来终不见何义全的面，遂起疑心追问，李伢子不肯说实话，故亲自出去找寻，结果在一处民家把他拖出来，当场打了一顿，警告他如果下次不改就枪毙他，岂知何义全年小胆大，当此话如耳边风，还偷窃了戴的钱出去赌博，因此被戴下令枪毙了。

三、侍从室的机要组与军事委员会的机要室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下设一个机要室，主任为毛庆祥，副主任为徐宏涛，设有第一、二两科，分别掌管收发电报，编制和印密码本，以及党政军的密本使用、换发、保管等事项，并附设专线电总机收发报室（其人员、器材统由电信总局管理），还有国防部派送的无线电台。其工作性质虽与侍从室的机要组大同小异，但是它的业务范围要大得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兼侍从室机要组长，两处都属一个人领导。

关于该室每天收来密电译出后的处理办法，即视其性质，如系普通的或例行公务，就送办公室主任批阅并抄副本转知有关部门处理，凡属重要而带请示的电报，必须送侍从室转呈蒋介石亲自核批后再行处理。总之，无论党政军的一切要事，都逃不出侍从室的这一关口。

军事委员会机要室第一科的译电员有 20 余人之多，昼夜不停地收发电报。每个译电员必须具备保密的条件，还要懂密码技术和加减码表的使用方法，对每一个电报的

识非常熟练，来电如系明码，则不用翻电本，就可将内容全部一字不差地写出；如果是密码，则须在保密员处将原电本取出，按照加减码的规定翻译。倘遇错了码子译不成文时，则研究分析，万一研译不出，只有发电追询原发电人，要其照该电再发一次，直到问题解决为止。

此外还有电务员数人专管摘要事项，把来电的重点简单扼要地写在摘要纸的事由一栏，例如某军长来电：（一）催发几月份军饷，（二）催发冬季服装等等，送蒋阅批后，则将所抄副件交有关部门处理，原电留存科室归档。

第二科的职掌范围是编、印、发党政军所用的密电本和配附的加减码表，尤其是军用本最重要。其中专用本（红色）是发给行营主任和司令长官用的；通用本（蓝色）是发给军师长等用的；对通本（黄色）是发给党政首长或部长用的。每个密本所配属的加减码表都有详细说明，夹在密本内，但是没有密码技术能力的，还是无法运用，必须经过译电训练方可胜任。

蒋介石对于军用密本非常重视。我记得有一次机要室所派译电员王星舟随蒋去西安回来，不知在什么地方丢失了一个通用本，被蒋知道后就把王星舟移交给侍卫长，并将王关进禁闭室。此人后来是否释放，不得而知。

四、技术研究室

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设在重庆南岸黄梅垭南山，是专门研究国内外情报密码的一个技术机构，其主任为毛庆祥，秘书主任薛藩滋，人事科长毛玉珊，秘书魏士俊，总务科长余同文，情报整理室秘书吴国瑞，以上人员均属主任办公室的成员。下分四组，分别掌管业务，第一组组长孙少珊，管理中文密码；第二组组长黎椿寿，管理外文密码；第三组组长王忠良，管理外文密码。以上均系研究密电码工作，任务繁重，其中以第二组黎椿寿研究日本海军密码卓有成效，获得蒋介石赏给的特别奖金。第四组组长吴兆麟专管窃听世界各国及国内情报电码，并设有大型收发报机，昼夜工作不停（地址在黄梅垭正对面半山上）。该室研译出来的情报经过整理后即送侍从室机要组处理。

1945 年元月，毛庆祥因身兼数职忙不过来，便辞去技术研究室主任一职，并保荐侍从室专员王俊杰调任该室少将主任，同时又由军统局调来萧坚白担任少将副主任。抗战胜利后，该室全部工作人员陆续分水路和空运，迁往南京小营地区继续办公。

1946 年 10月，因侍从室机构已撤销，不得已才将原有的技术研究室改编为国防部第二厅技术研究室，现职人员共有 200 余人。当时成立主任办公室，主任王俊杰，副主任萧坚白、谢朝章，其他人员均按原有级别和职务未更动。 1948 年元月，侍从系（王俊杰）、军统系（萧坚白）双方发生争权夺利的冲突，结果王俊杰被排挤停职，后到台湾省政府任秘书。当时从军统局调来魏大铭接任技术研究室主任，而副主任二人均未变动，秘书主任调用金戈，人事科长杨宝康，后又调王维宪继任，总务科长田德标，整理组长樊桑甫，中央电监组长张络民，下设编、印、发及军电法规、军电人员管理登记等科。

1949 年元月，南京开始紧张撤退，该室全体人员先迁逃上海，后由上海再迁广州

除在上海的中外文研译人员全部送往台湾外，其余编印发的工作人员 140 余人迁往广州市多宝路多宝坊继续办公。

同年 6 月，魏大铭由台湾来到广州，把技术研究室的 140 余人就地遣散了 80 余人，仅留 60 人改编为国防部第二厅第四处，处长为冉一鹤，副处长袁世奇，内分五个科，有发本科长王忠良，编本科长沈彭年，军电法规科长潘汝舟，军电人员登记科长束志复，总务科长王维宪。1949 年 8 月，这批人员又逃往重庆，驻复兴关继续办公，直到11月间国防部二厅全部人员奉命遣散。每人发给资遣费，校官发黄金二两，尉官发黄金一两五钱，士兵发黄金五钱，领到遣散费后的第三天重庆就解放了。

五、军电管理处

军电管理处名义上是军事委员会的系统，而实际隶属于侍从室直接领导，与机要组有密切关系，其处长一职由机要组的副组长徐宏涛兼理。徐系浙江奉化人，曾留学法国，与毛庆祥是同学，感情很好，交际手段非常高明，因此在抗战后期张笃伦被毛庆祥保荐任重庆市长时，徐宏涛也被保荐任重庆市的社会局长，这是一个肥缺。那时贪污盗窃上行下效，到处风行，不足为奇。例如在渝的一般奸商申请领开厂营业的执照时，必须花上一笔巨额的运动费，才能准许发照开业，这是无官不贪的一个具体例子。

军电管理处的职权，一是军电保密，凡属军事机关或部队首长发来的电报，不论有线电或无线电均须按照规定一律用加减码表循环使用方法的密电拍发，否则如被军电处查出某电是用明码发出的，失去了保密作用，马上就要以军委会名义向发电的部队首长提出严重警告，同时视情节轻重给该电务员以记过或罚薪和降级等处分。因蒋介石对军电保密问题特别重视，故在管理方面格外严格。二是对全部译电人员的调查登记，训练任用，统一管理等等。在训练方面已另有译电人员训练班招收学员，负责训练，毕业后统由军电管理处分配到军事机关和部队中去，有时还须派往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机要室先行实习三个月，再正式派充译电员，因为军电密码的技术相当繁琐，如不专心学习和熟练，就无法担任这项工作。

六、攻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码

在重庆抗战时期，技术室研究外文密码以日本的军电为主要目标，集中在第二组研译的有黎椿寿、孙少珊、聂文逊、朱少先等，他们都是通晓日文曾留学日本多年而富有密码经验的技术人才。

黎椿寿领导几位密码专家夜以继日地在第二组密室合作研究，遂于 1941 年下半年把从无线电收发报窃听得来的日本海陆军发出的密电码研译成功，并能掌握它的密码变换和掩护等方法。蒋介石知道后深为嘉许，除犒赏特别奖金外，还通知该室总务科，为通宵达旦研究的人员每夜预备鸡汤、牛奶和面包充饥，以资鼓励。

有一次（时间记不得了）技术研究室送来急件，是一份日本海军密电的译稿，内容大意是日本海军部密令它的航空母舰、主力舰、巡洋舰等开往太平洋中某一小岛

（岛名已忘记）集中待命，矛头可能是指向珍珠港的。毛庆祥接阅此急件后加以研究，并查看太平洋全图和该小岛距离珍珠港的远近，乃亲自上楼送蒋介石核查，而蒋阅后马上以电话邀请美驻华大使魏德迈前来侍从室谈话，密谈约一小时，魏即将原电抄件带去。后据侍卫官传说，魏德迈很不相信，认为日本所派特使来栖三郎带了他的美籍夫人正在白宫与罗斯福总统谈判，还没有结果，决不致于发生意外。他更不相信中国有如此技术人才，能攻破日本的海军密码。因此魏还要研究和考虑，延搁了二天半的时间，他才把原电密码译送华盛顿。哪知事已迟了，珍珠港海军基地于头一天被日本航空母舰的飞机突然偷袭，惨遭轰炸。

罗斯福被日本欺骗受到这次痛苦的教训后，遂下决心对日本作战。同时派遣研究密码技术的代表团数十人来中国学习，并亲笔写信给蒋介石提出中美合作问题。当时由蒋密谕交戴笠负责处理，开始成立了中美合作所，以后逐步扩大组织，包括情报、间谍、特务、暗杀等等。

七、日本投降时陈公博的一封密电

在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时，技术研究室的无线电台忽然接获由南京汪伪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发出的一封密电，经机要秘书张廷桢审查电码时发现是宇密，但在抗战八年中从未有宇密电本发出，故无法研译，异常着急。后来译电员王礼安想起陈公博在抗战前曾当过实业部部长，发过通电密电本，于是在旧档案箱中翻出宇密原底本，便将原电全文译出：“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日本已正式投降，关于日军应缴械的武器装备粮弹仓库以及南京所管辖的各军队均着令在原地待命，希钧座速派负责大员来宁协商接收办法，以免被他方劫夺，惟公博之命运请恩予保全为祷。 ”蒋介石接阅后即批复一电，大意是电悉，应予嘉勉，已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专机来宁负责全权处理，希与何部长洽办可也。同时蒋与美军司令部负责人举行会谈作出决定，由美方调派大批军用运输机（包括陈纳德的航空志愿大队），于即日起将集中芷江的机械化部队约一个师全部空运南京布防，一面派何应钦乘专机率领随员到达南京布置受降事宜。

据侍从室所派懂日文的参谋周大漠（跟随何应钦去宁工作）回来时说，那天举行受降仪式时，日方所派代表是冈村宁次，还有随从武官二人，态度还是很傲慢无礼，因周大谟用日语与该武官谈话中提及这次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事失败，日本武士道也没有用处，作何感想。其中有一武官答复说，日本皇军作战没有失败，只是中国的朋友交得好，换言之，就是说中国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的。由此可见，日本军人征服东亚的侵略美梦至死不悟。关于陈公博的命运，何应钦在渝临行时，蒋介石早已面授机宜，故在处理受降的事毕以后，把他关押起来作了阶下囚， 1946 年南京最高法院开庭审理两次，最后经过公审大会判决予以枪毙。

（ 1963 年）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语班内幕

郝　纶*

一

1942 年 2 月中旬，正当抗日战争紧张阶段，国民党中央各大报如《中央日报》、《扫荡报》等，用大篇幅刊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语人员训练班招考”的广告。投考资格是大学毕业，有工作经验、擅长外语者，训练期为一个月，工作是分配到友邦盟军担任翻译，待遇从优。报考地区包括大后方各大城市，如江西上饶、广西桂林、贵州贵阳、云南昆明、甘肃兰州、西安、四川成都、重庆。

同年 3 月中旬，在原报原版篇幅刊出各考区录取名单，各区共录取 350 名，规定 4 月 1 日到重庆赣江街 16 号本班报到，4 月 15 日为截止期。

4 月 1 日起陆续有些人到班报到，都属成都、重庆两地的录取人员，是一些刚毕业找不到生活出路的大学毕业生。此外，以西安到来的人较多，有 12 人。而质量较高，如有卸任的县长、科秘方面的失业人员，多系北方来的北大、清华毕业生，目的是想藉外语班关系来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到了截止期时，全部报到人数还不到 30 人，其他远地各考区只有一二人报到，只得延长报到期限，宣布到 4 月底为止。经过各考区的极力鼓动拉拢，到限期只有四人到来。连前报到的，共报到 32 人，无法开班上课。

于是只有等待，等到 6 月底，一共仅有 38 人到来。

7 月 1 日起开始正式开课。此后，7 月中旬，又有三人抛弃了全部衣物行李分别逃跑，逃跑中有贾琴白（前四川国民党省党部工事，解放后在重庆市第九中学担任语文教员）。

问题在于，为什么国民党那样地大张旗鼓，用优厚待遇作花招，大肆进行招揽，在大后方失业恐慌严重威胁下，竟然达不到招生人数，上钩者寥寥，已上钩者又急想逃脱。这其中的核心问题，考生识破了外语班的内幕，就是由于“军统”戴笠设立的阴谋陷阱，企图借外语班罗致大后方广大少壮的知识分子，扩大加强军统特务机构，巩固加强国民党政权。

这样，外语班的内幕很快就在各考区秘密传开，考生们厌恶戴笠为首的军统，所以报考的人数虽多，但录取者不愿报到，入班以后亦有逃跑。

* 作者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语班受训学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

外语班地址在前赣江街 16 号，即江西会馆。会馆东半部由“外事班”占用（全称是调查统计局外事人员训练班），西半部由外语班所占用，两班紧靠在会馆大院，互相可以望得见，但两班学员绝对禁止往来交谈，违者要受严重处罚。两者各走一门，都实行军事管制，岗位森严。

外事班是“军统”的秘密训练机构，学员是从军统各附属单位抽调来的高中毕业的年轻特务。训练结束后就派往“中美合作所”作翻译，实则充当侦查美国人员的国际间谍。中美合作所是美国和军统戴笠联合搞起来的反共机构。当时参加中美合作所活动的美方人员迈克尔·沙勤所写的《中美合作所：反革命在行动》一书中有详细记载。戴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同书中所下的结论最为恰当，书中说：“戴笠是一个臭名远扬的暗杀者、施刑拷问者、毒品走私贩和窃贼。”外语班就是在戴笠领导下开办的，所以外语班性质就很清楚了，学员是被骗来的。

两班学员虽明令禁止往来，但两班私下秘密相互透露的东西还是多的，如外事班透露军统的黑暗专制手法而提示外语班学员有：（一）要牺牲一切，献身“革命”不得翻悔；（二）怕泄漏军统秘密，不得脱离，如中途脱离，必遭暗杀；（三）终身独身，不准婚配。……并经常透露有名有姓被军统杀害的人员。所有这些都刺激新到的外语班学员惶恐不安，造成思想情绪极度紧张。因此在训练过程中，两班曾发生一些奇怪的恐怖现象：7 月 15 日深夜两点钟，在灯火辉煌的外语班宿舍里（通夜不关灯，怕逃跑）骤然怪声四起，有吼叫声、呼救声、尖叫声、“立正”口令声……，各种怪叫声汇成一片，整个大院阴森森的像座鬼城，于是人们从床位上跃起，光着身子，表演出各种怪相，有作端枪射击状、有举起扁担、有抱衣物奔跑。在这历时 3 分钟的混乱中，在大宿舍的四周楼板和过道走廊有成百上千人的奔跑脚步声。等到天明以后，查问这人群的来历，都说根本无此事。这便更严重引起人们的疑虑，推测多端。经管理人员和武装军人到场打招呼，这场风波才算平静下来。第二天，管理人员到班上说：这样的“惊营”事件，在部队上并不算什么怪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事隔五日，7 月 20 日下午，全班举行野外实弹打靶射击实习，有步枪、手枪两项，安排在“射击台”上进行。在手枪射击过程中，有浙江大学毕业的姓郑的学生，正端起枪准备射击，突然手枪走火，砰然声中子弹弹出，正打中身旁等候接班的原清华大学毕业的姓张的学生。当即送医院抢救，全班人都显得思想沉重。在当晚深夜人静时，突然有人高声喊：“米司特张回来了！”全班人惊醒，根本没有张某的影子。

第二天早上天还未亮，医院来电话说：“张某因枪伤严重，无法抢救，已于昨晚深夜两点死亡。”

于是更引起班上学员惊恐不安，疑团重重，联系昨晚大宿舍种种怪现象出现的时间，正是张某死亡的同时，于是更加重了班上阴森恐怖的气氛。

凶手当晚被押送他处，班上议论纷纷，对肇事原因，多方猜测。有人说死者系共产分子，凶手系受军统指使藉机开枪的。

三

外语班表面上是由“军委会外事局”主办，实际上，外语班的组织结构、人事安排、教师课程、训练管理都受到军统的直接控制和安排，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千方百计要把外语班办成培养军统特务的一个组织。

外语班主任是“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长商震，副主任两个，一个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另一个是戴笠。

班主任下设教务、管训、总务三股。三股负责人均由军统派员充任，实际总负责人是戴笠的心腹、军统大特务郑锡林。

学习的科目有英语读本、英语翻译（分口译、笔译）、英语会话，政治课有党义（包括三民主义），特务课有通讯技术、盯梢学。英语课由董显光、沈剑宏（科长）等人担任，政治课由郑锡林担任，特务课由军统办公室重要特务人员担任。

管训方面设有中队长、分队长三人，政治干事二人，都是军统办公室的多年熟练特务，随时找学员作个别谈话，谈军统与“革命”关系、军统工作与个人前途，尽量用甜言蜜语拉拢软化，达到引诱上钩的目的。还有什么为了“革命”，为了党国利益，要服从需要，牺牲一切，献身“革命”，以麻醉学员的思想意识。

戴笠灌输外语班学员的军统意识，是多种多样的。

每周星期一上午 8 时，在军统局大礼堂，召开“总理纪念周”大会，规定外语班整队前往参加。每次大会参加人数都在千人以上。

在纪念周大会上，除了照例全体朗诵“总理遗嘱”以外，每次都由戴笠包办大会讲话（训话）。讲话内容每次大体相同，前半部都是国际大局、抗战形势，并把共产党大骂一通，说什么共产党军队在前方如何不配合作战，奸党（指共产党）在后方扰乱社会秩序等；后半部都在夸张军统工作如何重要，取得了哪些成就，“蒋委员长”如何重视，如何嘉许……，勉励大家多作贡献，努力工作，还要作好保密等等。

在每天早晨升旗和下午降旗的两次集会上，班上的中队长、分队长或政治干事到场领唱“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除此之外，每次都要训话，包括遵守纪律，严禁同外事班学员来往或交谈，不得轻信谣言，还有抗战形势如何好，对“我”军战场如何有利……，勉励大家要“忠党爱国”等等。

在外语班结束前的 7 月 30 日，晚饭后，天已黄昏，忽然吹号紧急集合，整队上车，并不宣布事由和将去方向。只见车子向北急驰奔跑，经过沙坪坝、杨公桥直到童家桥下车。天已漆黑，不辨方向，只是跟着“中队长”向前走，沿途尽是坡路、羊肠小道、山沟，同学们一路上鸦雀无声，手捏把汗，心里忐忑不安，都在猜想，究竟今晚将要发生什么事故。后来走了约五六里路，到达一个大院。满院灯火辉煌，布置着一个会场。同学中有熟悉这地方的，才秘密传说，这里就是“中美合作所”。

会场上约 200 多人，尽是青年男女，主席台上戴笠已先到，等着开会，还有两个外国人。每人面前摆着丰盛的茶点，有冷有热。

教务股长郑锡林宣布开会后，全副武装的戴笠站起来开口讲话说：“今晚的大会是

个迎新大会，欢迎外语班同学们参加我们的‘革命’工作，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会场响起热烈掌声。戴笠接着说什么外语班同学都是大学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擅长英语，有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今天来参加我们的“革命”工作，将来必能起到很好的骨干作用，希望大家很好地合作起来。

接着是一个青年讲话，说什么今天有新同志、新弟兄来参加我们的“革命”行列，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他代表“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

接着是文娱节目，有音乐、歌唱、舞蹈……节目繁多，目的是使外语班同学感到兴奋和愉快，以期迷惑引诱新的同伙们。

四

7月底，是外语班训练期满的时候，也是军统拉人下水的最后时机。

7 月 30 日外语班宣布停止上课。7 月 31 日早饭后，“中队长”忽然吹响口笛，到教室集合开会。大家到教室坐定，看到教室周围竟有武装军人背枪巡逻，教室内中队长、分队长、政治干事都到齐。中队长一看全部学员都就坐，从皮包内取出纸张，散发给每人一张。大家一看，是填表，表名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工作人员登记表”。大家望表发怔，没有动笔，也无人吭声。过了一刻钟，政治干事发言催写，只有少数人开始动笔。后来经过几次催促，仍有过半数不动笔。到 12 点钟，政治干事宣布要大家多考虑，下午仍到原课室集合。

下午，教务股长郑锡林到课堂讲话，说：“大家要搞清楚，填表不等于加入军统，加入军统还要经过考验，还要举行宣誓仪式，才算是正式的军统人员。大家不经过填表手续，等于训练没有结束，还要继续在这里呆下去。”大家这才把表填了交去。

8 月 1 日，早饭后紧急集合，中队长宣布，全班人员要参加重庆市人口普查，分别派往城郊地段派出所，配合警察户籍员进行工作，大家要提高警觉，发现可疑不法之人，要采取措施，争取两天作完。跟着点名，分别派往指定地点。后来事完之后，回到班里，大家才明白，这次普查是一次政治性的考验，系配合“皖南新四军事件”，对共产党来一次重要打击，也是对外语班学员的一次最后测验。

8 月 3 日上午 8 时，外语班举行结业仪式，班主任商震主持会议并讲话。戴笠也在场，并未讲话。

仪式完后，立刻集合站队，听候戴笠唱名叫入他办公室（外事班主任办公室），进行分配工作前个别谈话（一个接一个地进行）。戴笠第一句就问“你对工作的意见怎样？”结果不约而同地分成两类，一类是愿到外事局工作，另一类答听从分配。35 人中，前类占 20 人，后一类占 15 人。两类人均在当天下午用汽车送走。前类送往外事局接收，后一类送中山二路军统本部办理报到手续。

到军统报到的 15 人中，大多系刚从大学出校的青年人，经过宣誓手续，正式成为军统特务，分配到有关部门，算作军统直系特务。到外事局的 20 人中，大部分派往印度加尔各答中国远东军训练营替美军教官作翻译，算作军统的旁系特务。

（1983 年）

国民政府军政部军务署编组内幕

杨　植*

一、军务署的组成

1944 年冬，在何应钦掌握军政部长达十四五年之久下台后，军政部长遗缺由陈诚继任。陈遂将军政部局部改组，把办理军务业务方面的原军务司和交通司两个司扩大成为军务署，下辖六个司及一处一室（把原军务司扩充为步兵、 工兵、通讯兵及骑炮兵四个司，把原交通司扩充为交辎兵司及机械化兵司两个司，另设有一个总务处和一个署长办公室）。军政部设有军务署这一机构，是自 1944 年冬陈诚接任部长时起，直到 1946 年夏该署合并到国防部时止。我从 1945 年 10 月在该署机械化兵司任科长，直到改组时离开，下述都是亲所见闻。

二、军政部局部改组原因

陈诚垂涎军政部为时已久，一旦到手，就不放松控制，企图实现他的野心。但陈为什么不将军政部全部改组而仅限于办理军务以及人事方面呢？ 原因是由于陈崛起在后，后来居上，资格较浅，党羽羽毛这时还不够丰满。他的党羽， 基本上是军人，其他军事机关部门如兵工、军需、军医等方面的军佐人员，根本没有抓到手，所以陈接任军政部长后，对原有之兵工署、军需署及军医署等单位，约占该部编制总人数四分之三左右，不仅原封未动没改组，而且人员仍旧无变动。当时兵工署署长系俞大维，军需署署长陈良，军医署署长林可胜。这三个署长中，林可胜系华侨，抗战才任职军政部，与何应钦关系不深，陈诚对他无戒心。但俞、陈都是何应钦任部长时的老人员，任职有十余年之久，虽均非何之死党，但与何的私人关系不错。特别是陈良，原是蒋介石的亲信，曾被称之为蒋的帐房，所以陈诚对陈良只能敷衍待之，对俞大维则以同乡关系进行拉拢。军务署机构在军政部里占有重要地位，其他机构，实际都是从属于它的，所以陈诚接任军政部长以后，把何应钦时代办军务的一些机构全部改组，成立军务署，下辖六个司及一处一室，主要人员如科长以上全部撤换，主要科员也留用极少。新遴选的人员，主要系陈的骨干，其次则选用与何无关系的一些人。例如交辎兵司、机械化兵司两个司科长以上人员，在陈诚派系中尚难找熟悉这项业务的党羽，就任命素与何无直接间接关系的陆大教官王镇为交辎兵司司长；以曾任陆大研究员的胡家裹与曾任航空委员会特务团团长

* 作者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军务署机械化兵司上校科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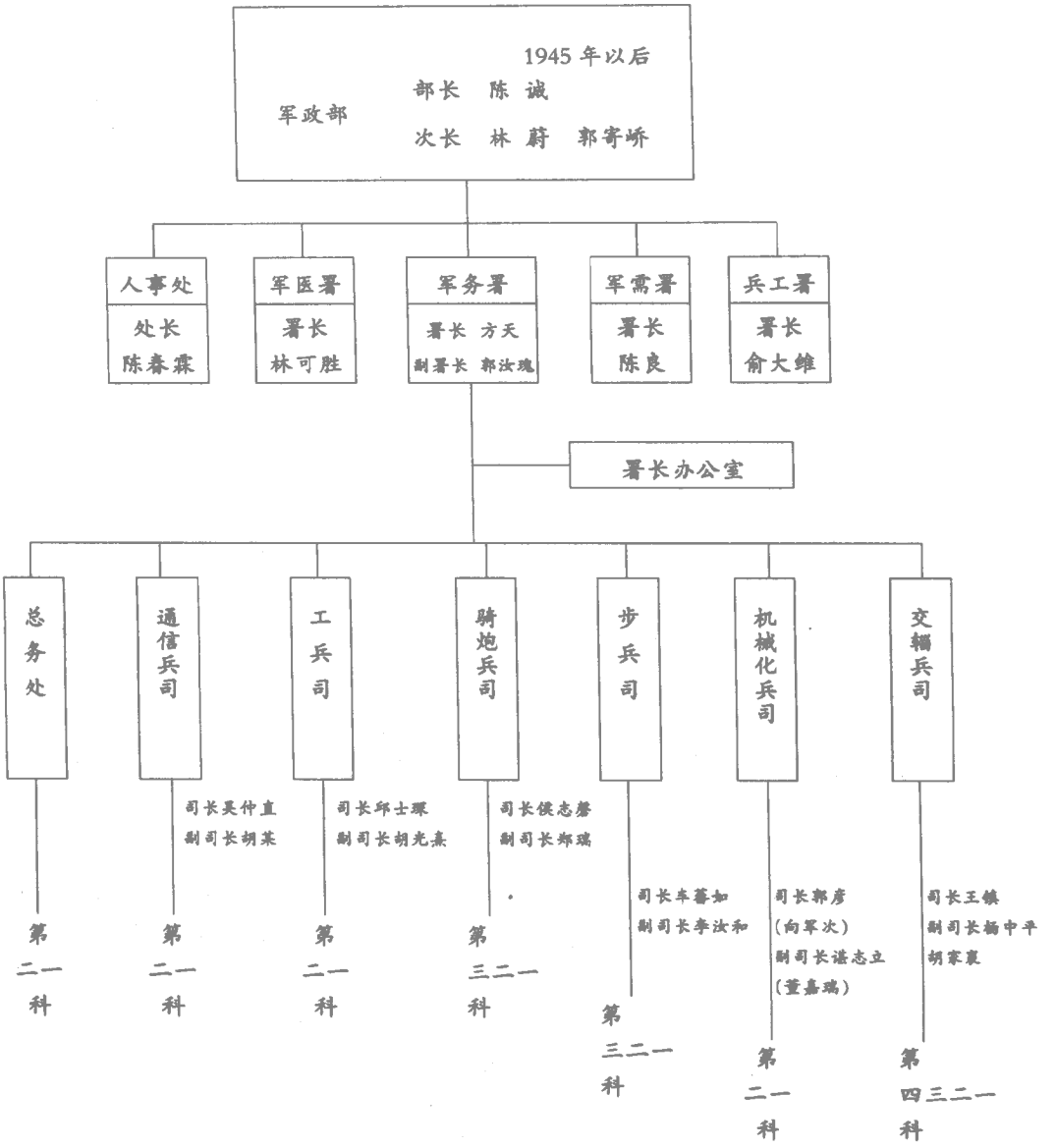
的杨中平为该司副司长；以曾在胡宗南那里任过战车兵团团长的郭彦为机械化兵司司长；曾任陆大研究员的谌志立为该司副司长，继谌之后则为刚从陆大特八期毕业的董嘉瑞。其他如工兵司、骑炮兵司的情形，略与上同，选任了一些既非陈的党羽，又与何无关系的一些人。军务署下辖的司、处、室的正副主官多系陈的党羽，因此陈派系中仅有这些角色。当时，在任命中曾闹出如下的一个笑话：在发表郭彦为机械化兵司司长时不知郭的住处，命令无法送出，因此郭在命令发表一个多月后，才到差。原因是郭不满胡宗南把他从战车兵团团长调职为一个步兵师任副师长，遂私自把他的家迁到西安某小巷居住，闭门谢客，外人很少知道他的住址。这时机械化部队中的中上级干部，都掌握在徐庭瑶手里，徐又系何应钦的死党，郭虽与徐有极短一段长官部下关系，但关系不深，陈要想找一个与何无关系的适当人充任机械化兵司司长，除郭外别无其他人，所以陈诚迫不及待地在未找到郭的下落和未征得郭的同意的情况下就把命令发表了。发表后，经过多方打听，才找到了郭。郭在失意之中，受到陈的青睐，自感受宠若惊，乐于从命，这也充分反映何陈两大军事派系的斗争表现。后来陈诚在军政部还专设人事处，主管部内外人事，以陈的亲信陈春霖为处长，内设有七个科，范围非常庞大。

三、军务署组织及其主要人员

军政部军务署的编组，主要按各兵种的性质而分设各司，由于骑兵那时在部队里逐渐减少，而接近淘汰，所以该署把骑兵业务并入在炮兵里而称之为骑炮兵司，其他组情形，见军务署组织系统表。

军务署自副司长以上的正副主官学历大多系陆大毕业，少数系国外留学生，例如方天、郭汝瑰、王镇、吴仲直、侯志磬、向军次、胡家褒、谌志立、董嘉瑞、李汝和等均系陆大；郭彦、郑瑞、杨中平、胡光熹等系国外留学（郭留法、胡留英、杨郑均留德）；方天、吴仲直均系陈的十八军旧部（方曾任过该军军长，吴在方之下充任过师长），方系陈诚派系中的骨干，又在陆大特别班十一期毕业，陈诚想利用方天有陆大这一学历的关系而拉拢一批陆大人员作他党羽，以壮声势，故任命方天为署长，所以后来军务署人员为陆大所包办，虽然也用不少留学生，但留学生只不过作为陪席和撑门面而已。

军政部军务署组织系统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